

## 我国城镇化战略及其与工业化的关系研究

(分报告)

**摘要:**城镇化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经济。建国以来,我国城镇化历经了与国家战略和工业化发展模式相随的大落大起历程。目前尽管我国城镇化已较快增长,但是学术界普遍认为我国城市化发展仍滞后于工业化进程。本文在总结我国城镇化进程特点的基础上,认为我国的城镇化是伴随着工业化的不断发展而出现,是农村要素不断转化为城市要素和城市要素不断向农村扩散的双向互动的过程。在通篇思考中国城镇化的背景下,对中国城镇化与工业化关系的研究,主要根据中国 1980—2010 年的城市化和工业化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得到各个变量的平稳性结果;利用协整分析来研究城镇化与工业化长期稳定关系;利用格兰杰因果检验研究城镇化与工业化的格兰杰因果关系,并且将中国放到全球视野中横向对比分析了中国城镇化和工业化问题。最后,研究得出城镇化与工业化改革势在必行的结论并因此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 城镇化, 工业化, 改革

依据中国经济的历史特征与未来趋势,十八大提出“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等战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指出“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走集约、智能、绿色和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城镇化带动区域发展的新阶段:中国城镇化战略的有效实施将重构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关系,产业调整升级为主轴拉动人口城市化,最终实现城乡统筹的发展。

因此,十八大提出的中国城镇化作为发展城市化经济的重要方式,有其深刻的内涵。首先,中国的城镇化是通过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带动人口进城;其次,中国的城镇化是经济规模扩大伴随着要素聚集度的提高与城市承载能力的增强;第三,中国的城镇化是国民福利水平的整体提升。下文总结了十八大以来的城镇化研究观点,审视中国城镇化的历程与态势,思考历史时期中国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关系,通过分析城镇化发展存在的重大问题提出推进中国城镇化健康发展的思路。

### 一、“十八大”以来中国城镇化研究综述

中国已经步入了工业化中后期,但人口城镇化速度相对世界水平较低,城市化质量与规

模不匹配，统筹城乡发展的经济效率、社会、人口发展、环境承载等问题较为突出。如何通过城镇化优化国土开发格局、促进产业调整升级、统筹城乡发展、提升人口整体福利？面对城镇化新挑战，“十八大”所提中国城镇化明确定位于扩大内需、经济结构调整升级、人口城镇化率提高与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目标。目前各界寻求相关城市化议题解决的研究主要可从产业、户籍、土地方面概括。

新一轮城镇化发展“以人为本”，新型工业产业拉动内需的城镇化依旧是保持经济较快发展的强大支撑。新一轮工业化的基本要求是“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即重点发展创新、高效与正外部性的产业拉动人口城镇化。从全国范围看，城镇化是优化区域之间配置资源的过程，最终有利于实现区域协调发展。从国内外发展实践看，如果工业化超前于城镇化，会因城市配套设施的缺乏，出现交通拥挤、资源短缺、环境污染、房价暴涨等问题。反之，则会由于城镇化缺乏必要的产业支撑，出现产业“空心化”和就业不足现象，产生贫民窟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刘奇葆，2012）。城镇化带来的人口集聚和产业集聚，不仅能够推动生活和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也能够推动教育、医疗、就业、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体系的发展，产生循环累积效应从而改变服务业发展滞后的局面。同时，城镇化进一步促进工业结构转型升级，通过资源整合和优化配置、聚集人力资源等，推动我国工业从大变强。因此，推进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互动，才能形成城乡发展的一体化新格局，同步实现产城融合模式下的良性发展。

户籍制度是改革开放以来影响中国人口城镇化水平和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因子，当前按户籍统计的实际人口城镇化率 35% 的数值表明了城市公共服务平等化的不均衡。中国中央政府试图借助“城镇化”实现中国工业化下一轮劳动力转移和居民消费扩张，但户籍制度的存在使得最为关键的人口城镇化面临巨大阻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何宇鹏认为，“积分落户”将是户籍改革的突破口（[J](#)财经网,2013）。户籍改革沿两条主线进行，一是逐步减少与户籍挂钩的权利和福利内容，同时支持农村、农业发展，增加农民的社会福利，以缩小农业和非农业人口之间的收入差距，朝着城乡一体化利益格局迈进；二是放宽城镇户口的准入条件，淡化非农业和农业户口的区别，以加快农村居民向城镇转移，为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奠定基础(杨莉英,2012)。

农村土地改革是提高土地生产率并推动农村劳动力就业的有效方式，它也为农村城镇化创造了可能的需求空间。一般认为，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是城镇化发展除户籍改革之外的最大难点(和讯网,2013)。为解决城镇化进程中的用地“瓶颈”，需要土地配置市场化、农村土地资本化，优化农村产业结构，为实现统筹城乡发展探索出一条新路。但是，中国东中西区域

在自然和经济领域的异质性，以及中国农村人口参与市场能力的差异，在农村土地的市场化经营与农民对城市文明的适应上还具相当压力。因此，农村土地改革需要制度与市场力量双管齐下，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也有较为稳健的社会保障体系支撑。

最终，城镇化战略最终落脚于国土空间的发展均衡，但这一目标的实现是一个复杂的议题，现实中需要以经济发展为核心协调时间、空间、要素、观念等方面。在全球化、技术变革、全球政治觉醒的背景下，新型城镇化要超越行政界限，从要素集聚和经济社会活动辐射范围的角度重新认识城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2013)。因此，城市作为产业和人口集群在地球表层突出的空间表征，中国城镇化的核心仍要以产业拉动要素聚集，积极发展城市群、城市带和多样化城镇，发挥集聚效应促进产业和城市的深度融合并实现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促进社会公平发展。

## 二、中国城镇化的历程与态势

### (一) 新中国成立后的我国城镇化历程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持续高速发展，我国城镇化取得很大提升，改变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城市发展落后的局面。到 2012 年底，人口城镇化率由 1957 年的 15.7% 上升到 52.6%，城镇人口总量历史性地超过农村人口，标志着中国已进入城镇化率高速增长阶段。城市人口大规模增加的背后，是我国城市数量和规模的增长。到 2012 年我国地级以上的城市由 1957 年的 177 个增加到 288 个，超过 100 万人口的城市由 29 个增加到 125 个，建制镇由 2173 个增加到 19522 个，城市群逐步形成，城镇设施和功能不断完善。

表 1 新中国成立后的城镇化特征

阶段	启动阶段	波动发展阶段	停滞阶段	快速发展阶段	大规模发展阶段
时间	1949—1957	1958—1965	1966—1978	1979—2012	2013 年—
地级以上城市数量(个)	177	175	191	288	**
末期人口城镇化率(%)	15.7	17.9	19.7	52.57 (户籍制为 35.29)	**

数据来源：《新中国 55 年统计资料汇编》、《2006—2012 年中国统计年鉴》。

分析中国城镇化特征背后的根源，工业作为城市发展的重要载体，工业增长方式的演变是影响中国城镇数量和规模的重要原因。建国到改革开放的初期，由于受传统体制的约束，我国的城市化与工业化相互分离，工业发展以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营企业为主导，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阻碍了工业化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则先后经历了乡镇集体经济主导模式、

分散家庭工业为主导的市场经济早期模式和外资及混合型经济为主导的工业发展模式(刘勇, 2011)。新型工业化的道路有力地促进了城市化的发展, 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 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下半期开始, 中国城市化滞后的现象正在逐步消失, 城市化与工业化相互适应的关系正在逐步得到确立, 十八大后又将迎来新一轮大规模的城镇化。

因此, 新中国成立是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新起点, 改革开放 30 年来我国城市化发展速度明显加快, 目前已经进入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

## **1.都市圈(城市群)已经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龙头**

由于一些具有区位、资源和产业优势的城市, 经历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 已经达到了较高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这些城市互相融合, 形成了城市发展相对集中的都市圈或城市群。其中, 长江三角洲都市圈、珠江三角洲都市圈、京津冀都市圈水平较高、相对成熟; 山东半岛城市群、辽中南城市群、中原城市群、武汉都市圈、海峡西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和关中城市群等初具规模。都市圈(城市群)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龙头, 标志着我国城市发展体系逐渐走向成熟。

近年来的区域经济发展格局, 显示出区域间的竞争已经不再是单个城市的竞争, 而是以都市圈为基础的区域间的整体竞争。都市圈的形成和都市圈之间的分工、合作和竞争, 主导全国经济的发展格局。而在都市圈或城市群内部则形成了一定的产业组织和分工协作关系, 地域分工协作网络正在形成和发挥作用。

## **2.城市投资环境改善,基础设施逐步完善**

中共“十六大”以来, 我国城市建设迅猛发展, 交通设施日趋完善, 邮电通讯业发展迅速, 绿色环保的城市生活环境正在逐步形成。在基础设施方面, 加快构建城市快速路网, 是大多数城市交通建设的重点; 在城市新区, 加强与中心城区的交通联系成为建设的重点; 加快市政、公用、能源设施和环境建设, 推进基础设施配套, 更是多数城市共同关注的中心议题。

由于各城市加大了基础设施建设和改善投资环境的力度, 增强了吸引外资的综合优势, 为吸引更多优质外资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例如, 2012 年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不包括市辖县) 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 24925 家, 项目(合同)金额 1339 亿美元, 实际利用外资金额 1117.2 亿美元, 保持了长期以来较快增长的局面。从一个方面反映出城市化发展的成就。

## **3.城市社会保障体系初具规模, 社会公共服务功能进一步增强**

与城市经济不断发展同步, 城市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 城市社会公共服务功能进一步

增强。在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中多次强调公共服务均等化等，从而从指导思想规定了城市发展的目标导向，这就是加强城市的社会功能，优化城市的发展环境。

我国在 1980—1990 年代，比较多地关注城乡之间在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距，而“十一五”之后，则转到注重解决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问题。城市政府把提供公共产品服务的基本职能突出出来，期望通过转移支付、社会保障等公共财政工具，实现城乡人均收入差距的缩小。所采取的主要措施是：中央政府加大对中西部地区和广大乡村的财政转移支付，加快发展教育文化、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为构建和谐社会创造条件。

#### **4.城市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创新能力进一步提高**

城市的产业结构优化，与国际和国内产业转移密切相关。国际产业链向中国转移，由过去转移加工制造业，到现在转移公司总部、市场营销机构、营运中心等整个产业链，在这种背景下国内的产业转移也会加快。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和主要的省会城市成为公司总部、产品研发、市场营销中心，中小城市作为加工制造业基地的趋势日益明显。

这种城市之间的分工，从地区的协调发展上显现出来。在生产要素和部分产业由东向西、由中心城市向周边地区转移扩散的同时，包括高端劳动力、研发和公司总部等则表现出进一步聚集的趋势，中心城市的积聚效应进一步加强。

### **（二）中国城镇化发展的态势**

中国城镇化过程经历了缓慢发展而后大起的阶段以后，已经进入了持续、加速和健康发展阶段，并呈现出以下主要的三个方面的趋势：

#### **1.大城市为主体的多元化城镇化道路将成为我国城镇化战略的主要选择**

我国地理经纬度跨度较大，海拔、气候与区位条件差异明显，因此城镇化发展道路必然需要因地制宜。今后在原有大城市基础上，通过土地流转、户籍改革和产业升级，多样化的小城镇也将成为我国城镇化战略的主要选择。

#### **2.城市群、城市圈等将成为城镇化的重要空间单元**

在各级城市普遍得到发展的同时，东部大城市、区域中心城市及城市密集地区发展加速，成为区域甚至国家经济发展的中枢地区，成为参与世界经济和应对全球化挑战的重要空间单元。

#### **3.东西差距依旧，但城镇化整齐推进**

虽然我国空间差距还将持续较长时期，但城镇化率将整体加速。由于历史的路径依赖与

区域经济发展机理，城镇化发展的区域重点经历了由西向东的转移过程，总体上东部快于中西部，南快北稳，在沿海一些发达的特大城市，部分城市正逐步走向国际化。在城镇化战略的指导下，全国城市密度将持续增加并带来产业和就业人口的地理聚集，产城融合力度将不断加强。

### 三、中国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关系

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关系是极具争议的重大问题，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理清：什么是城镇化，什么是工业化，以及城镇化（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关系指的是什么关系。已有的世界历史经验与有关城市研究基本表明，城市是发展工业的最好的载体，工业化是城市化的经济内涵，城市化是工业化的空间表现形式，二者相互促进。以上关于我国城镇化的特点分析，无疑是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工业化进程分不开的。以下就从实证的角度，对我国城镇化与工业化关系进行了评估。

#### （一）关于我国城市化与工业化关系的争论

在城市化问题的研究中，关于城市化与工业化发展水平的探讨始终是中心话题。Davis 和 Golden（1954），Graves 和 Sexton（1979），WDR（2000）通过收集并分析世界各国城市化进程的观测值，得出随着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上升，世界各国城市化轨迹是一条被拉长的 S 型曲线，先是缓慢发展然后有一个快速发展阶段最后趋于平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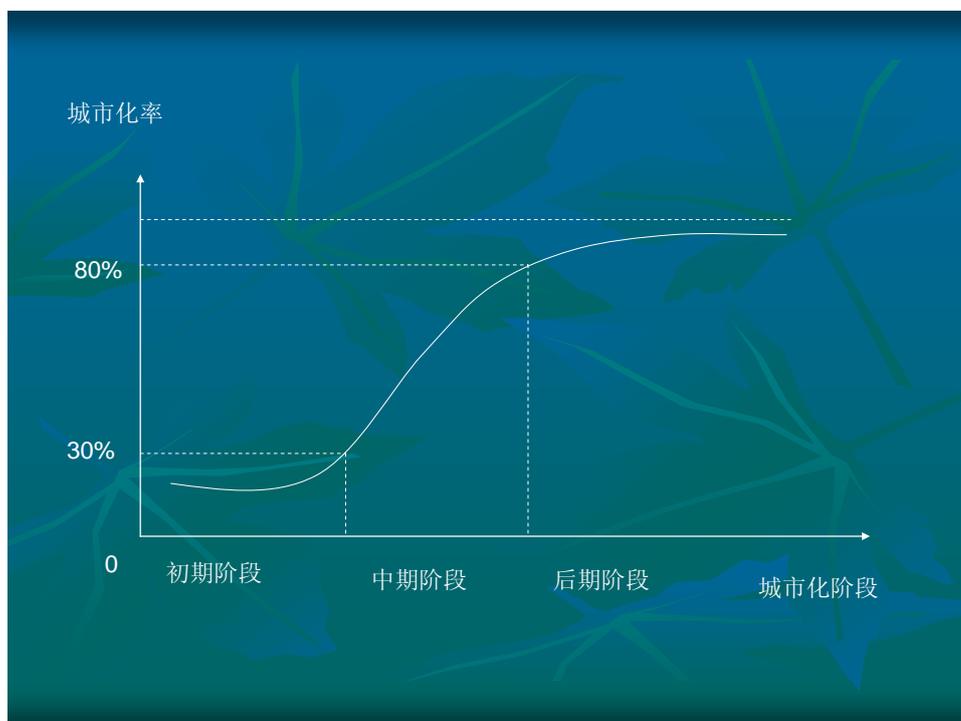


图 1 城市化的 S 型曲线

Davis 和 Henderson (2003) 指出不是所有的数据都支持“S 型”关系。由于各个国家在统计口径、经济结构等各方面的差异,世界各国的城市化演进不会完全遵循统一的发展模式,以某些观察值对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模拟不一定客观。

对中国城市化与工业化是否协调的争论是全球学术界普遍感兴趣的问题,大多数国内外专家学者认为,相比其他国家在类似的工业化发展阶段,中国的城市化发展滞后。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城市化起步晚,基础差,但是在过去改革开放 30 年间,中国一直在缩小和其他国家城市化的差距,例如 Ebanks 和 Cheng (1990), Chang 和 Brada (2006)。2000 年以后,国内涌现出一批学者认为我国的城市化水平与工业化发展阶段之间是协调发展的关系,例如安虎森和陈明 (2005),陈明星、陆大道和查良松 (2009)。邓宇鹏认为中国存在着“隐性超城市化”,认为应当将在乡镇企业就业和外出就业 6 个月以上的农村劳动力,再乘以平均每个劳动力需要分摊的人口 1.75,作为隐性的城市人口,从而计算出 1997 年我国的隐性城市化率为 30.4%,再加上政府统计的城市化率(29.92%),实际城市化率为 60.32%,这样,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我国就处于超城市化状态。<sup>1</sup>

我国的城市化是伴随着工业化的不断发展而出现,并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发展,是农村要素不断转化为城市要素和城市要素不断向农村扩散的双向互动的过程。以下对城镇化与工业化关系的研究分为两部分内容。首先研究中国城镇化与工业化的相互关系。对中国 1980—2010 年的城市化和工业化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得到各个变量的平稳性结果;利用协整分析来研究城镇化与工业化长期稳定关系;利用格兰杰因果检验研究城镇化与工业化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最后,我们将中国放到全世界的背景下进行研究,通过横向的对比分析了中国城镇化和工业化问题。

## (二) 中国城镇化与工业化关系的计量分析

### 1. 计量方法

在研究城市化与工业化关系的文章中,大多数研究都集中在研究两者是否协调的问题上,比较通用的研究方法有如下几种。(1) 直接比较城市化率和工业化率来判断两者是否协调。这种方法饱受批评,没用理论和现实的根据。(2) 采用钱纳里标准方法。钱纳里方法是人均 GNP、工业化水平、城市化水平与钱纳里总结的一般规律进行比较,判断中国工业化超前还是城市化超前。(3) IU 和 NU 的国际标准值法。IU 和 NU 国际标准值法认为是认为 IU 越接近 0.5 和 NU 越接近 1.2 就表明国家或地区的城市化与工业化是保持协调发展的。IU

---

<sup>1</sup> 邓宇鹏.中国的隐性超城市化 (J).当代财经, 1999(6)。

指劳动力工业化率与城镇化率的比值，NU 指劳动力非农化率与城镇化率的比值。(3) 计算衡量协调程度的系数来判定协调程度。这些方法没用从经济机理来理解城市化和工业化的互动关系，仅仅依靠一个经验的现象总结（钱纳里）或者先验地假设一个应有的协调程度（协调系数）来度量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关系。这些方法的优点是容易计算，易于理解，缺点是无法理解城市化和工业化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促进作用，无法把握城市化率和工业化率背后的经济机理，这对于指导现实而言是不够的。

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关系非常复杂。尽管城市先于工业化而存在，但工业化发展的聚集作用无疑促进了城市的增长，从这个意义上工业化是因、城市化是果。但城市能够产生聚集经济效益，共享更大的市场，反过来又促进工业化的展开。因此，理论上存在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双向的关系，实际中究竟表现为哪种关系需要进行实证分析。以下利用协整关系研究我国城镇化与工业化的稳定关系，利用格兰杰因果检验研究城镇化与工业化的格兰杰因果问题，以达到对该问题内在机理的把握。

## 2. 变量和数据

对于指标的选取，城镇化的度量指标一般用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及城市化率，这个指标没有太多争议，本文沿用这个指标。工业化内涵的广泛导致度量工业化指标的多样，但本文选用人均 GDP 和非农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两个指标来度量工业化水平。

为保证数据的连续和可比，本文选用世界发展指数在线数据库（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缩写为 WDI）1980 年-2010 年完整时间序列数据，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 180 个国家数据都来自这个数据库。选取的变量名称和定义如下：

表 2 选取的变量名称和定义

变量名	变量定义	单位
urb	城市化率	(%)
gdppc	人均 GDP	(\$)
nagr	非农业增加值占总增加值比例	(%)
lurb	城市化率取对数	
lgdppc	人均 GDP 取对数	
lnagr	非农业增加值占总增加值比例取对数	
d_lurb	变量 lurb 一阶差分	
d_lgdppc	变量 lgdppc 一阶差分	
d_lnagr	变量 lnagr 一阶差分	

## 单位根检验

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的前提是数据的平稳性，因此检验各个变量的平稳性是进行

数据分析的第一步。先绘制主要变量的时间趋势图以对变量的平稳性有个直观的认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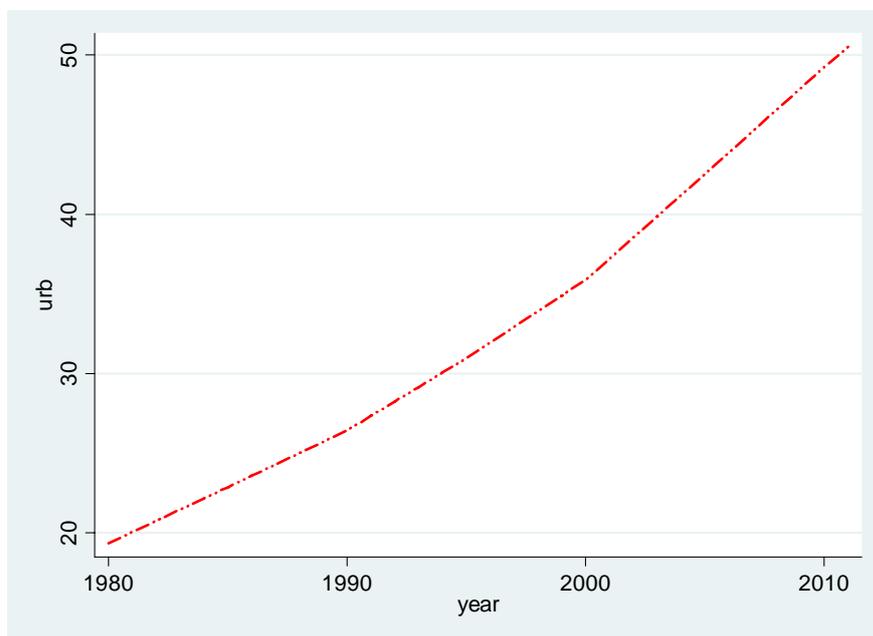


图 2 城市化率时间趋势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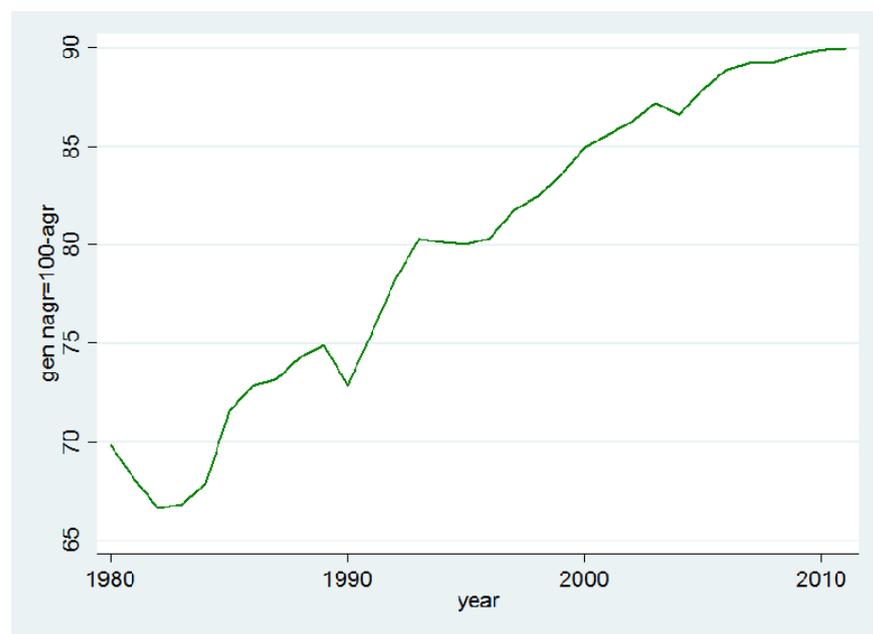


图 3 非农产业增加值比重的时间趋势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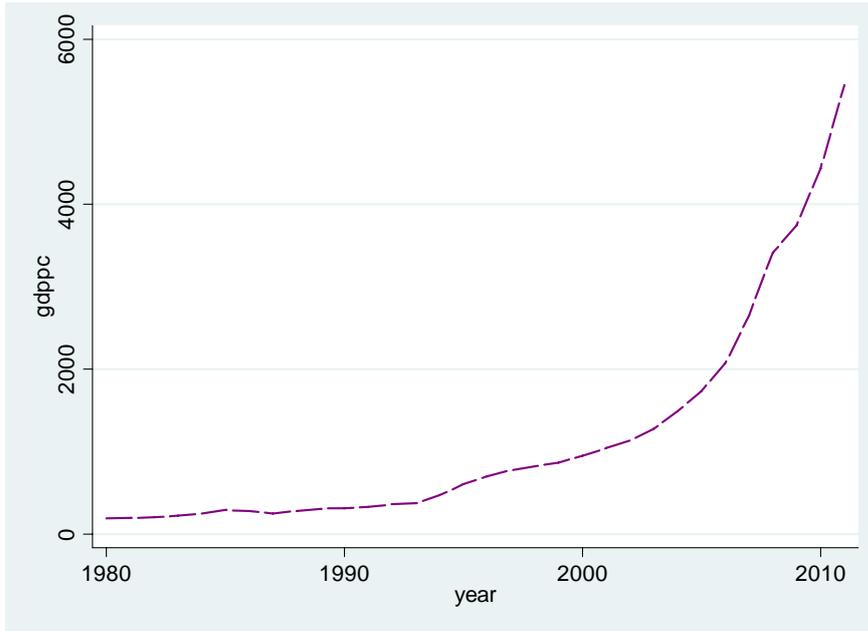


图 4 人均 GDP 的时间趋势图

从上面的图中可以看出，城市化率、非农增加值比重、人均 GDP 三个变量都是不平稳的。对它们取对数然后绘制时间趋势图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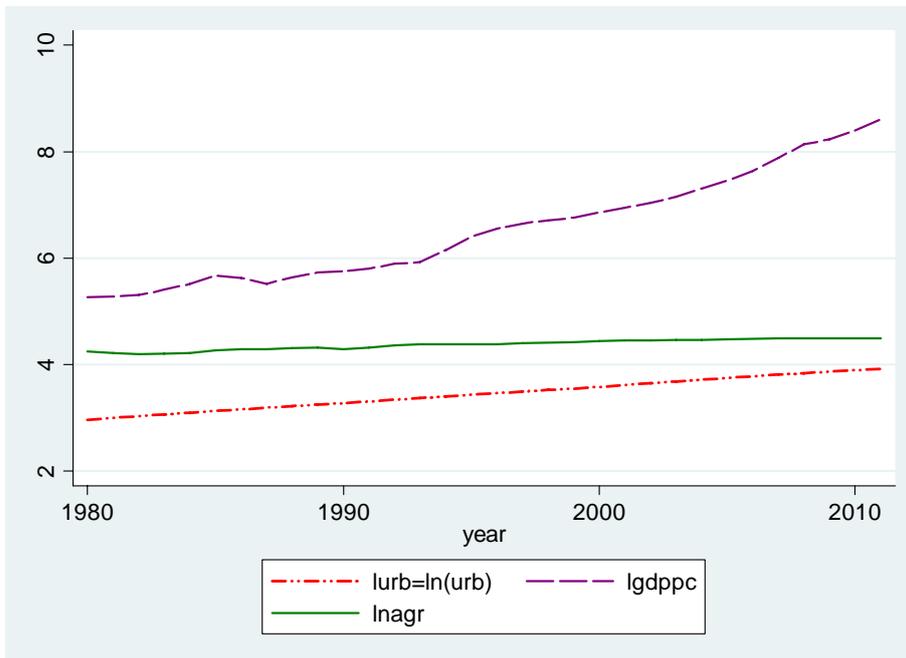


图 5 城市化率、非农增加值比重、人均 GDP 取对数后的时间趋势图

从上图可以直观地看出，取对数后的变量仍然不平稳。为更准确地确定它们的单整阶数，对三个变量及其一阶差分进行单位根检验。

表 3 平稳性检验结果表

变量	ADF 值	检验类型(c, t, k)	1%临界值	5%临界值	平稳性
----	-------	---------------	-------	-------	-----

lurb	-1.901	(c, 0, 0)	-3.709	-2.983	不平稳
lgdppc	3.26	(c, 0, 0)	-3.709	-2.983	不平稳
lnagr	2.735	(c, t, 7)	-4.38	-3.6	不平稳
d_lurb	-5.169	(c, 0, 0)	-3.709	-2.983	平稳***
d_lgdppc	-3.862	(c, t, 7)	-4.38	-3.6	平稳**
d_lnagr	-5.669	(c, t, 6)	-4.38	-3.6	平稳***

注：检验类型 (c, t, k) 分别表示 ADF 检验中是否会有常数项、时间趋势项以及滞后阶数，\*表示 10% 的显著水平，\*\*表示 5% 显著水平，\*\*\*表示 1% 显著水平。

上表 lurb、lgdppc、lnagr 三个变量都不平稳，而其一阶差分都平稳，由此可以判定这三个变量都是一阶单整过程。从下图也可以直观看出，差分后的变量基本是平稳的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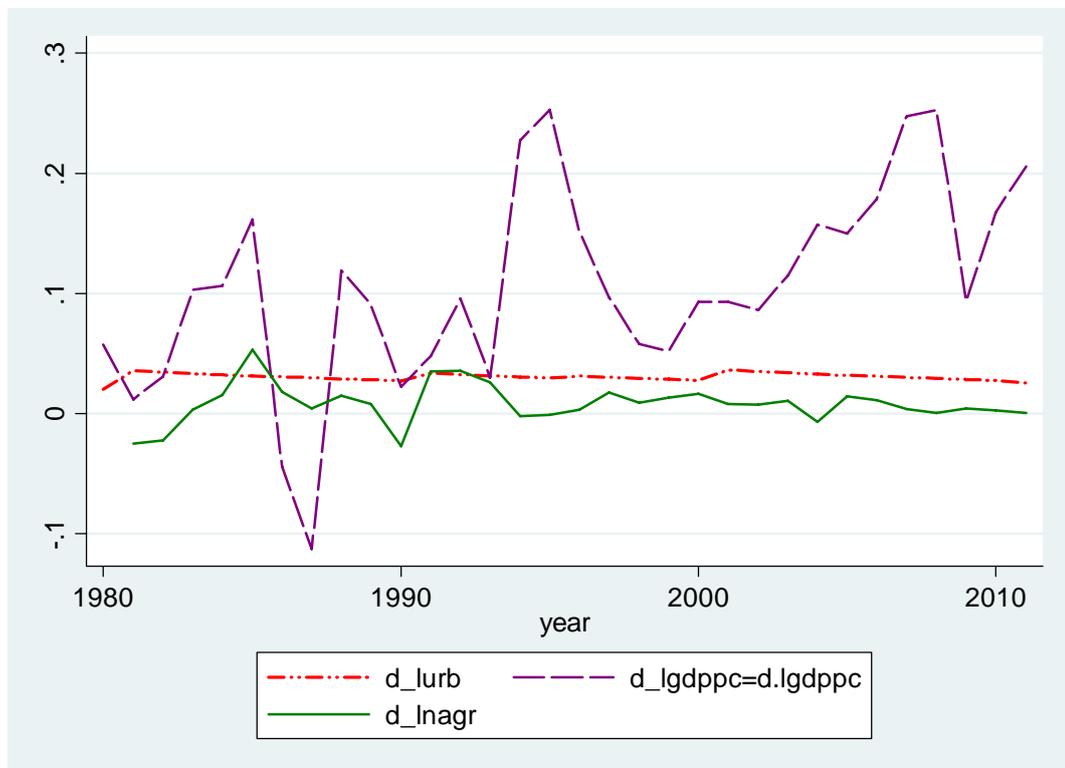


图 6 城市化率、非农增加值比重、人均 GDP 一阶差分后的时间趋势图

### 3. 协整检验

通常非平稳时间序列变量进行 OLS 回归估计时存在“伪回归”问题，一种处理办法是通过差分将变量变为平稳变量，然后进行一般的 OLS 回归；另一种办法就是协整。所谓协整，是指对个非平稳变量的某种线性组合是平稳的，这种经济变量之间的长期稳定关系就构成了协整。

本文采用 Johansen 协整检验的方法来检验城市化水平和工业化水平之间的协整关系。

表 4 协整秩检验

阶数	迹-统计量	5%临界值	$\lambda$ -max 统计量	5%临界值
----	-------	-------	--------------------	-------

0	35.8984	34.55	23.8788	23.78
1	12.0196*	18.17	8.663	16.87
2	3.3566	3.74	3.3566	3.74

从上表可知，存在一个协整关系，协整秩为 1。也就是说，城镇化率、非农增加值比重和人均 GDP 之间只存在一个协整关系。

下面检验 VAR 系统的滞后阶数。【varsoc d\_lurb d\_lngr d\_lgdppc】

表 5 滞后阶数检验

lag	LL	LR	df	p	FPE	AIC	HQIC	SBIC
0	89.2696				4.20E-07	-6.16212	-6.11848	-6.01938
1	255.895	333.25	9	0.000	5.5e-12*	-17.4211*	-17.2465*	-16.8501*
2	264.852	17.914	9	0.036	5.70E-12	-17.418	-17.1125	-16.4188
3	266.797	3.8893	9	0.919	1.00E-11	-16.914	-16.4777	-15.4867
4	276.952	20.31*	9	0.016	1.10E-11	-16.9966	-16.4293	-15.141

从表中可以看出，VAR 系统的滞后阶数应当为 1 阶滞后。可以得到协整方程如下。

$$\text{lurb} = -4.0373 + 0.1285 * \text{lgdppc} + 1.5 * \text{lnagr}$$

$$(0.0174835) *** \quad (0.1708712) ***$$

检验模型残差是否存在自相关：经拉格朗日乘子检验，模型残差不存在自相关，说明模型滞后阶数是适当的。上面的方程便是城市化率和工业化水平之间稳定的关系。

从协整方程结果可以看出：首先，我国工业化与城镇化之间存在稳定的正向关系，工业化和城镇化之间不存在相互抑制的阻碍作用。这个结论是对我国城镇化和工业化关系性质的基本判定，也就是理论上城镇化与工业化的相互促进关系在我国是存在的，但实际中何者其主导作用需要进一步判定。其次，人均 GDP 对城镇化率的弹性是 0.13，也即人均 GDP 每增长 1%，城镇化水平增长 0.13%。非农产业增加值比重对城镇化水平的弹性为 1.5，也即非农产业增加值比重每增长 1%，城镇化水平就提高 1.5%。可见，非农产业增加值比重对城镇化的影响明显高于人均 GDP 提高带来的影响。

#### 4. 格兰杰因果检验

协整检验判定了城市化与工业化之间存在稳定的长期关系，但实际中究竟何者起主导作用无法从协整方程中看出。因此，接下来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

利用城市化率、非农产业增加值比重、人均 GDP 三个变量组成的滞后 4 阶的 VAR 系统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为保证 VAR 系统的平稳性，对变量 lurb、lnagr 和 lgdppc 进行了一阶差分，检验结果如下：

表 6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检验变量	因果关系方向	零假设	卡方值	P 值	结论
lurb	lnagr → lurb	非农产业增加值比重不是城市化率的格兰杰因	0.409	0.982	我国的城市化与工业化之间不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
	lgdppc → lurb	人均 GDP 不是城市的格兰杰因	7.7134	0.103	
lnagr	lurb → lnagr	城市化率不是非农产业增加值比重的格兰杰因	7.0102	0.135	
lgdppc	lurb → lgdppc	城市化率不是人均 GDP 的格兰杰因	4.3917	0.356	

主要关注城市化和工业化之间的格兰杰因果关系，对于衡量工业化程度的两个指标（lnagr 和 lgdppc）之间的因果关系并不关注，因此尽管它们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格兰杰因果关系但不做报告。

从格兰杰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工业化和城市化之间不存在格兰杰意义上的因果关系，也就是衡量工业化水平的变量及其滞后值无法解释城市化水平的变化，反之亦然。

因此，协整检验的结果表明我国城镇化和工业化之间存在稳定的长期关系，而格兰杰因果检验对变量进行差分处理后并未发现两者之间存在显著的格兰杰因果关系，这说明，尽管长期中我国城镇化和工业化之间存在稳定关系，但两者之间的即时联系非常薄弱，与二三部分相呼应，其主要原因如下：

（1）我国城镇化和工业化之间缺乏有效的联动、连接和传导机制。短时间内城市化和工业化之间不能很好的相互影响，不能很好得衔接，难以实现及时有效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存在阻碍工业化和城市化之间即时交流的障碍，最突出的便是户籍政策。本文衡量工业化的指标之一便是非农产业增加值比重，所以研究结果表明这个比重提高意味着工业化水平的提高，会有利于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进而提高城市化率，但由于户籍政策的存在，这一过程受到阻断，因此工业化难以表现为城市化的格兰杰因。

（2）由于我国历史上的超前工业化和重工业化的政策导致农业比重较低，城市化水平提高并未有效促进我国非农产业增加值比重的提高，因此城市化也没有表现为工业化的格兰杰因。

（3）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检验的结果也说明了过去我国的城市化政策并不以经济效益为目标，更多的以政治指令为转移。回顾我国历史上的城市化政策，1983 年之前我国采

用“切块设市”模式，即从县中将经济活动聚集程度比较高的地区切出来设为市；1983—1997 实施“整县改市”模式，也就是将整个县域设为市，由此也掀起了一股“县改市”的热潮，大量不符合设市条件的地方也设了市；1997 之后中央政府处于保障耕地安全的考虑停止了大量设市。可以看到，我国的城市化政策完全受政治力量的干预而非出自经济效益的内在要求，因此城市化没有很好地服务于工业化也就不足为怪了。

因此，我国城镇化和工业化之间存在正向的长期关系，但缺乏有效的相互作用的机制和桥梁，存在阻碍两者即时沟通的障碍，也因此表明当前的城镇化改革势在必行。

### （三）中国城市化与工业化关系与世界的对比分析

中国的城镇化与工业化进程问题的研究不能离开世界城市化和工业化研究的大背景，通过对世界城市化与工业化发展状况的分析，能够更准确地把握中国的发展态势。文章选用世界发展指数在线数据库（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缩写为 WDI）1980 年-2010 年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 180 国家城镇化与工业化的相关数据进行面板数据模型分析。

根据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文章将所有国家分为四类：低收入国家，中低收入国家，中高收入国家，高收入国家。低收入经济体指其 2010 年平均收入在 1005 美元以下的经济体，中低收入经济体的平均收入为 1006 至 3975 美元；中高收入经济体的平均收入为 3976 至 12275 美元，高收入经济体的平均收入为 12276 美元以上。

采用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分析，首先进行豪斯曼检验来判定那种模型更适合，结果如下。

表 7 豪斯曼检验

豪斯曼检验	卡方值	P 值	结论
世界	86.58	0.0000	固定效应模型
低收入国家	6.79	0.0789	随机效应模型
中低收入国家	3.38	0.3367	随机效应模型
中高收入国家	5.65	0.1297	随机效应模型
高收入国家	2.35	0.5025	随机效应模型

经过豪斯曼检验，发现世界全部国家的面板数据回归应当使用固定效应模型，而低收入国家、中低收入国家、中高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四类面板数据回归应当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回归结果如下。结果中加入了上节对中国数据的协助分析作为一个参照。

表 8 世界城市化与工业化关系回归结果

区域	lgdppc	lnagr	_cons	R <sup>2</sup>
世界 (FE)	0.0861068***	0.10111***	2.686074***	0.4898
	0.0030912	0.0134193	0.0570047	

低收入国家 (RE)	0.1390731*** 0.0187405	0.1532232*** 0.0375986	1.689913*** 0.1553734	0.1554
中低收入国家 (RE)	0.1344541*** 0.0063951	0.0316598* 0.019038	2.543408*** 0.1051678	0.1241
中高收入国家 (RE)	0.0903828*** 0.0052783	0.1612638*** 0.0563214	2.578774*** 0.2339258	0.1531
高收入国家 (RE)	0.0378017*** 0.0023341	0.0771208*** 0.0231608	3.515901*** 0.1119842	0.0631
中国 (协整)	0.1285*** 0.0174835	1.5*** 0.1708712	-4.0373	

从上表可以得到如下结论：首先，世界整体以及各种不同收入水平的国家中，工业化和城市化之间都存在正向的关系，并且这种关系非常显著。上表中，本文选用的衡量工业化水平的两个指标的回归系数都是显著的正值说明了这一点。这个结果一方面验证了城市化与工业化相互促进的理论，同时城市化与工业化关系的性质都是正向的说明无论低收入国家还是高收入国家工业化都不会对城市化产生阻碍作用，对这一问题的判断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也就是说促进城市化与工业化良性互动的大方向是没有问题的。第二，随着一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关系强弱会发生变化。在上面表格中，人均 GDP 和非农增加值比重对城市化率的弹性在不同收入水平的国家群体中有不同的表现说明了这一点。这个结果表明，在处理城市化与工业化关系的时候应当充分考虑一国发展阶段对二者关系强弱的影响，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实现两者的良性互动。

#### 四、中国城镇化进程的重大问题分析

城镇化与工业化基本相适应，在以下几个方面为提出了课题：

##### (一) 城市人口集聚和城市规模普遍大型化的问题

城市人口的大量集聚会产生巨大的消费需求，提高公共设施的利用率。当城市化大大落后于工业化的时候，先把人口聚集起来是大多数城市的选择。如表2所示，我国平均的城市人口2012年是1990年的2.36倍。

表9 中国城镇平均规模的变化情况

年份	城镇总人口 (万人)	城镇人口比重 (%)	城市个数(个)	平均城市人口 (万人)
1990	30191	26.4	570	52.96
1995	35174	29.0	640	54.95
2000	45754	36.1	663	69.01
2001	48064	37.7	662	72.60
2005	56212	43.0	668	84.15

2007	59379	44.9	666	89.16
2012	71182	52.6	657	108.34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80~2012，2012年统计公报。

当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现象逐步消失、制造业企业开始向中小城市转移的背景下，是否还要继续追求城市平均规模的大型化，大城市规模和数量控制在多少范围内就成为了一个议题。

## **(二) 城镇产业集聚及其路径选择问题**

产业的集聚利于形成专业化分工和协作，推动相关产业和市场的建立，降低企业的生产流通费用，提高经济效率。产业发展的分工与合作的密度、细度、频度，只有在城市才能实现。城市是形成产业集群的重要环境基础，城市的发展通常会形成一定数量的产业集群。我国已经形成了一大批产业集群发展较好的城市，其经济发展及城市化水平较高。

当企业按照产业链条布局成为趋势之后，以发展总部经济为主的中心城市和以布局生产车间为主的外围城市的区分就十分明显。第三产业本质上是消费产业，是人类聚居模式改变后带来的。第二、三产业内部及相互之间的高度分工与合作促进了经济的繁荣与发展，促进了社会的分工。

对于一个城市，是选择做办公室，还是生产车间？选择什么类型的产业聚集，是摆在各类城市面前的一个艰难抉择。

## **(三) 城乡发展的土地占用与失地农民问题**

从世界各国的工业化、现代化历程看，城市化是伴随着市场化、工业化发生的，从二元社会结构向一元化结构转化和农村人口转移到城镇从事非农产业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农民的职业、身份和生活方式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即由农民转变为居民，从乡村生活转为城镇生活。城市化实质上是人口和土地同步城市化的过程。

然而，城市的刺激内需被狭义地理解为城市房地产业的发展，出现了乱占耕地现象的抬头。近年来，我国城市发展的空间失控现象严重，突出表现为城市蔓延式的扩张，大量占用耕地，造成了大量的失地农民。中央严控 18 亿亩土地红线的政策使这种趋势被遏制，但目前又面临新的威胁。2000 年我国城市建成区面积是 22439 平方公里，2011 年达到 43603.2 平方公里，城市面积扩张的速度平均每年增长 6.2%；相比之下，2000 年我国城镇总人口为 45906 万人，2011 年增加到 66557 万，城镇人口的年均增长速度仅为 3.43%，建成区面积增速与城镇人口增速之比为 1.81：1。有关学者认为这种城市面积扩张使超过 1 亿的农民失去土地，

从而出现了就业、保障、征地补偿等社会问题。

#### **(四) 庞大的城乡流动人口的户籍问题**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人口流动规模逐年增加。国家计生委公布的2011年全国调查数据显示，我国流动人口为2.3亿人，约占全国总人数的17.2%，其中，跨省流动人口占总人数20.7%。与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流动人口增加约一倍，跨省流动人口增加大于1000万人。人口流动的基本方向是由农村流向城市，大规模跨区域的人口流动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的一种不可逆转的社会经济现象。

随着大规模人口的跨区域流动，农民工在为城市繁荣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同时，他们的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却无法得到妥善解决。就业不稳定，收入水平低，生活状况差，社会保障滞后。农民工虽然生活就业在城镇，与当地入一样为城镇的经济发展作贡献，却只能成为漂泊在城镇的边缘群体，城镇没有完全接纳农民工，农民工远没有真正融入城镇。

上述城市化发展中的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到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健康发展。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理清问题产生的原因，从而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

我们认为，主要原因有：

##### **第一，城市定位不准确，对城市发展的区位条件、产业基础的认识出现偏差**

城市的定位包括等级定位和功能定位两个方面。等级定位是指城市在区域城镇体系中的地位。功能定位是指城市在区域城镇体系中的功能分工，这是避免产业（部门）相同构成重复建设的关键。在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中，很多城市的发展定位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和缺陷。例如，有很多小城镇要求形成中等规模的城市，中等城市规划要做成大城市或者是特大城市，多个城市要求建成国际大都市。

归纳起来，一是城市功能定位求高求大，很多城市没有依据本地的区位条件、产业基础和发展形势进行科学的等级定位和功能定位，带有很大的盲目性；二是地方政府追求做大区域的增长极，片面强调城市首位度。城市首位度反映了该国或地区的城市规模结构和人口集中程度，首位度是一个中性词，尚没有理论研究表明首位度越高越好。

##### **第二，城乡分割的管理体制和城乡发展的巨大差异，造成城乡人口的大量流动，使农村的资源几乎没有成本地流向城市**

近年来，我国户籍制度的改革取得了许多成就，但还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城乡分割的二元管理体制。城乡二元管理体制使城乡二元结构得以制度化，在强有力的国家制度约束下，

农村为城市发展提供了大量资源，农村发展落后于城市，城乡差距日渐拉大。

城乡二元结构体制是导致城乡经济差距拉大、城乡失调最直接的原因，是城乡关系失调的制度基础。鉴于在城市中取得的较高工资报酬和较好的生活条件的预期，许多农村居民开始移居到城市。农村社会分裂的推力和城市经济发展的引力，是城乡人口流动的主要原因。由于传统的户籍制度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使得外来务工人员难以真正融入当地社会的工作和生活圈，即安居乐业，导致已转移出来的农村劳动力出现大规模的回流现象。因此，城市化的过程，难以有效地转变为吸纳农村人口的过程和覆盖城乡的人口结构转变过程。

### **第三，土地管理制度不完善，征地与供地之间具有巨大的利润空间**

就土地制度因素而言，一般认为我国城市大规模圈地的动力源自征地制度与供地制度之间巨大的利润空间，导致地方政府热衷于利用征地制度中的缺陷“以地生财”。征地制度的缺陷包括：征地范围过大，许多土地被征用的目的是商业开发而非公共利益；征地补偿过低，征地按原土地用途进行补偿，这种测算方法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没有体现土地潜在的收益和利用价值，没有考虑到土地对农民承担的生产资料和社会保障的双重功能，更没有体现出土地市场的供需状况；对被征地农民的安置不落实；征地程序不规范等。征地费使本应由农民分享的部分农地城市化溢价收益受到侵占，甚至使地租水平低于正常农村经济的要求。征地制度创造的巨大寻租空间，诱导开发商及政府行为扭曲，人为加大土地市场的投机性，开发区“开而不发”、工业园“圈而不建”的现象极为普遍。由于利益驱动的结果，地方政府特别是城市政府把土地看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以地生财，热衷于经营土地、经营城市。

## **五、推进中国城镇化健康发展的思路**

通过上面分析看到：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的问题，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随着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增长和国家综合实力加强，城市化作为 21 世纪中国实现和平崛起、迈向现代化的重大发展战略，目前已经进入了关键时期；随着城市化与工业化基本适应的阶段到来，也到了城市化进程战略思路的转变时期。

对于已经开展的我国城镇化的进程，笔者提出三点新思路：

### **第一，摆脱城市发展仅仅为工业提供载体的思路**

由于我国的社会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城市发展也必然受到经济全球化、新技术革命、构建和谐社会等因素的影响，城市化滞后工业化的问题的逐步解决，决定了必须从城市发展的本身去确定发展的目标，赋予我国城市化以新的内涵，构建一个全新的、符合科学发展观的、健康发展的城市化道路。

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新型城市化道路进程中，需要把握各个阶段城市化发展的程度，了解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城市的状态，调整城市在可预见的一段时期内朝着良性城市化方向发展。也就是说，需要更多关注建设宜居城市的问题。

## **第二，从强调做大城市转变到力求做强城市**

准确理解衡量城市发展的各种指标，从城市综合发展的大局去进行城市的定位。如前所述，城市首位度是一个综合的指标，不能盲目追求。城市化率同样是一个综合的指标，不能只从城市人口这个指标去衡量。要关注各项约束条件的情况，防止虚假城市化。城市化速度要遵循经济发展规律和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一些地区经济发展快，就业岗位多，城市化速度可加快些；城市化并不意味着城市空间的扩大、城市人口增加和城市设施完善，而是需要城市现代水平的提高，城市居民享受现代化带来的成果，城市居住环境质量不断提高，城市社会治安稳定有序。

在新的发展阶段，在推进城市化进程时不仅是调控量的增加，更要注重质的提升。城市化进程是一个复合型过程，涉及经济、社会和制度的方方面面，加快城市化进程，提高城市化质量，保障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和经济社会发展相衔接是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从实现城镇化率的明显提高到城镇化质量显著优化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

## **第三，树立城乡协调发展的思维**

城市是区域系统中的一部分，是区域的中心，区域是城市发展的基础。城市发展要依据区域规划，从整体考虑，发挥各大城市的优势，挖掘潜能，打破行政束缚，放眼于大市场，实现区域经济规模化、集团化、建立区域共同市场。要克服城市狭隘理解区域竞争，搞区域分割，互不妥协，自成体系，导致小而全和功能趋同。

## **第四，以城市群建设为载体推进城镇化**

以区域为载体以交通为纽带，以经济分工与协作为基础，组成城市群，充分发挥城市组团发展的优势作用。城市群内部结合现有各城市的现有实力和发展潜力，对城市群实行职能分工定位，达到充分发挥紧邻城市优势互补的功能，实现结对成群，融合发展，带动城市群区域的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 **参考文献：**

- [1] 刘奇葆. 以新型工业化与城镇化为动力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J]. 求是, 2012(5): 15.
- [2] 何宇鹏. “积分落户”将是户籍改革的突破口[EB/OL]. 证券市场周刊供稿.

- [3] 杨莉英, 高国忠. 城镇化进程中的户籍制度改革刍议[J]. 人民论坛, 2012(381):124-125.
- [4] 和讯网. 城镇化是核心最大难题是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改革  
[EB/OL]. <http://news.hexun.com/2012-12-17/149132452.html>.
- [5]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 世界城市化和城市发展的若干新趋势和新理念[J]. 中国发展观察, 2013(1):35-37.
- [6] 刘勇. 中国城镇化发展的历程、问题和趋势[J]. 经济与管理研究, 2011(3):20.
- [7] Kingsley Davis, Hilda Hertz Golden. Urbaniz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Pre-Industrial Areas[J].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1954(1):6-22.
- [8] P. Graves, R. Sexton, Over urbanization and its relation to economic growth for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 Economic Forum 8 (1) (1979) 95-100.
- [9] World Bank, Entering the 21st Century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99/2000,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 [10] James C. Davis, J. Vernon Henderson. Evidence 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urbanization process. J. Urban Economics. 2003(1): 98-125.
- [11] Ebanks, G. Edward, Cheng, C. China: a unique urbanization model. Asia-Pacific Population Journal 1990(3): 29-50.
- [12] Gene Hsin Chang, Josef C. Brada. The paradox of China's growing under-urbanization[J]. Economic Systems, 2006(30):24-40.
- [13] 安虎森, 陈明. 工业化, 城市化进程与我国城市化推进的路径选择[J]. 南开经济研究, 2005(1): 48-57.
- [14] 陈明星、陆大道和查良松. 中国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水平关系的国际比较[J]. 地理研究, 2009(2):464-474.
- [15] 段杰, 李江. 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特点、动力机制及发展前景, 经济地理, 1999(12)79-83.
- [16] 曾菊新. 现代城乡网络化发展模式,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1年版.
- [17] 张淑敏, 刘辉、任建兰. 山东省区域城乡一体化的定量分析与研究,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4(3) 65-68.
- [18] 朱丽霞. 中国大都市区域的城乡协调发展研究——以浙江省宁波市为例,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 2005(2), 149-154.
- [19] 陈秀山, 张可云. 区域经济理论,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5年版.

执笔：孙久文、和瑞芳、原倩

2013.5.25